

命运列车

知青返城沉浮录

群众 著

24291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林文洵 蒋晓云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策 划：廖家齐 莫光贵

书 名 命运列车

作 者 群 众

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mm 1/32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印数 6000 册 字数 290 千 插页

ISBN7-5411-1223-2/I. 1143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林文询	人生无终点	
——	编辑缀语	(1)
周晓和	难圆的梦	(4)
张抗抗	杨花·柳絮	(20)
叶 辛	我的又一次人生转折	(25)
张 放	枕上烟云	(30)
江 沙	布后街二号	(38)
又 文	拒绝沉沦	(53)
贺 黎	调动的故事	(80)
邓 贤	我要写本书	(84)
叶延滨	人生多故事	(95)
臧小平	惶惑与抉择	(107)
杨 琪	弟弟的琴声	(115)
袁 斌	原来他是知青	(125)
陈乃丁	一个平凡的追求	(132)
万郁文	母亲知我心	(138)
李 华	仍如过客	(144)
王定凡	沉浮人生	(150)

周佩红	焚烧的落叶·····	(159)
曲 博	归去来兮·····	(166)
胡大权	遇上好人了·····	(180)
吴三学	风雨人生书相随·····	(189)
余 成	校园旧事·····	(202)
徐建成	混大学·····	(212)
王仕陆	我别无选择·····	(216)
韩 蔚	感谢生活的赐予·····	(223)
刘晓航	寻找青春的足迹·····	(228)
杨鲁勇	越过冬季·····	(234)
田子铤	鞭策·····	(253)
刘继安	往事如烟·····	(264)
李 晶	只因我不甘·····	(279)
王 跃	不要当作家·····	(285)
胡筱静	命运是什么·····	(291)
周良宗	毕生走不出青春河·····	(294)
李永庚	酸甜苦辣·····	(299)
余善云	梦的情思·····	(315)
金 泉	她，献给生活七彩虹·····	(323)
饶新章	再别西昌·····	(335)
蒋晓云	工作着是美丽的·····	(341)
易刚初	但将心旅谱长歌（代后记）·····	(356)

人生无终点

——编辑缀语

·林文询·

人生难得百岁，逢十一祭便成了各人心中的大典。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如今谁都知道，这一段空前荒诞的历史（就整个运动而言），它的大背景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是随“文革”之兴而兴，随“文革”之终而终。因此，它也同整个“文革”一样具有史无前例的特质。这就难怪不仅当年的知青本身具有一种难以消磨忘怀的“知青情节”，走过了那段风雨历程，但是永远走不出那铭心刻骨的情怀；而且，今天，以至以后，凡是关注人类历史的人们，都将对此予以特别的看重和审视。这也就是当今方兴未艾的“知青文学热”的价值所在。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面对日益萎缩变形的图书市场，仍然决定义无反顾地将《知青岁月书系》继续编撰下去。继重点反映云南支边纪实的《青春无悔》，全面概述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档案》之后，如今我们又郑重推出记述知青返城之后新的坎坷新的悲欢的《命运列车》。

列车有终点，但是人生的历程没有终点。在“文革”的一前一后，当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忽而被整体地从城市抛向农

村，忽而又成批地被抛回城市时，从本体上讲，他们都谈不上选择，只有盲目或挣扎，都是畸型政治大掌中的玩物。无所谓真正自我的选择，也就谈不上悔与不悔的问题，根本无有悔与不悔的可能存在。有的，只是被那发了疯的列车拉来拉去的命运。

而随着“文革”的终结，当历尽坎坷饱尝艰辛的知青们带着各种创伤风尘仆仆重返故土时，急剧变化的城市生活又在他们面前竖起了一张新的陌生面孔。回城回家，这曾是几乎所有知青的梦想，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苦熬煎时所能做的最美的梦。然而这梦真的变成现实之时，严峻的生活告诉他们，一切并不都是想象的那么完美。世上没有完全通红的苹果，没有酥透流油的面包。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一切都得重新奋斗。消逝的不仅是青春年华，失去的不仅是知识文化。人生时空的大转移，人生轨迹的大变化，需要你付出的往往是成十倍的代价。

上海的知青女作家王安忆早在十年前就写过一篇审视这段转折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她很聪明，没有去重复那已经被若干人写过的知青的苦难过去，而是将视角瞄准了返城列车到达终点站后的新的人生旅程。谋生求职，读书安家，生存环境，人际关系……新的陌生，新的苦恼，新的搏斗，新的困惑……背上烙着“知青”印记的人们，每走一步总是比常人艰难许多。

当然，尽管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人生又总是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也许比较而言，知青们得到的比失去的少许多，但也决不只是磨练出了一身强健的肌肉，那种深切的对人生的认识，苦难的体会，意志的磨练，是他们返城背囊中不多的然而弥足珍贵的几件财富。因此，在继续跋涉的困顿艰难中，他们

也就可能撞击出比常人更明亮的火花，甚至辉煌。我这样以为，人生如果失去了百朵鲜花，固然可惜，但得到了一粒种籽，也值；失去了十件外衣，自是憾事，但得到了一根筋骨，便值。人生最重要的，抖穿了，说还是精神的风骨。

我很高兴，我看到在很多知青朋友的身上，都有这种风骨昂然峭然。我将继续为往日的知青，知青的今日，鼓呼呐喊。请相信，朋友，“知青”这一概念，不管你说它是灾难还是骄傲，是痛苦还是磨练，有一点确定无疑万古不变：“知青”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难 圆 的 梦

——返城后第一搏

· 周晓和 ·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
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
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
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也许还未感觉
我们已经走过昨天

我说不出来这是谁写的歌词，也忘记在哪里读过。但它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它总使我回忆。

1979年6月24日下午4点20分，从东方红到哈尔滨的慢车驶出了迎春车站。破旧的硬席车厢里，行李比人还多，形状各异的行李一看就属于知青。

我坐的这节车厢里绝大多数是返城的知青。车厢里很静、很静，没有青年人的朝气，也没有北大荒知青特有的欢欣劲儿。

列车有节奏地敲打着铁轨，在莽莽草甸子上缓慢地行进，战

天斗地十二年的地方——银门顶子、七虎林河被渐渐地抛向后方。夜幕降临了，窗外的一切都淹没在黑暗中，几十里不见一星灯火。

刚刚会哑哑学语的儿子懂事地依偎在我的怀里，小手不停地搔弄着我的脸，清亮的眸子一眨一眨，好像在问我：“咱去哪？妈妈呢？”我把脸贴在儿子脸上，泪流了出来。

摇摇晃晃的列车很快把儿子摇睡了，我靠在生硬的木条靠背上，不能睡去，眼前萦纡着她的身影。真是一场梦！

迎春火车站的月台上，到处站的是返城知青，他们成双成对，相视着，低语着。月台笼罩着一种莫名的悲壮。

她立在我面前，一会儿拉拉我的衣服，一会儿亲亲张着双手的儿子，把笑强堆在疲惫失血的脸上，不厌其烦地叮咛、嘱咐、安慰。

“看，人家不也走了，你还是去吧。”

.....

“要不，还是留下孩子，省你累赘。”

.....

“实在带不了就给我送来。”

.....

“注意身体。我没事儿。”

.....

“别，别……人挪活，树挪死。”

.....

感情的血澎湃着，撞得胸生痛，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她，我要返城了。我和她何时团聚？我不敢说，不敢想，怀抱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一步三回头，登上了已经启动的列车。

赵君、庄君、王君、李君和我，我们是同一天被热烈欢送
出北京，乘同一列火车到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现在又在同一列
车上了结这场梦。同样的课题——分居，搅扰着我们。其实，
这个时候才返城的知青百分之九十九都在思考着同一个课题：
我们经过长久的痛苦的感情折磨，以夫妻分居的昂贵代价，不
知所措地钻进了一条不知能否通畅的窄胡同，今后的日子里，谁
能帮我们圆这难圆的梦。

尽管列车负载着知青返回城市，可是知青在这里结下的情
却留下了，知青的心碎了。知青们心甘情愿地离别了广阔天
地。

北京站到了。同车的知青们相互道别，泪在眼眶里转，然
后，各走各的路。

在一位好心的老大爷的帮助下，我手忙脚乱地挤下公共汽
车，把儿子放在行李上坐定，肩扛手提，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放
下，喘着气，返回，再连抱带背地搬运余下的箱包。儿子瞪大
眼睛注视着热闹非凡的市井，紧紧拽着我衣角，摇摆着跟在后
边。一百多米后，又巴巴地坐在行李上，等待第二轮迁徙。行
李和我，行李、我和儿子，交替前进，移进了院门。

“快。叫爷爷、奶奶。”儿子听话地重复着。全家欢呼雀跃
了一番。然而我从父母兴奋的眼神里发觉了一种只有我才能感
到的愁绪。那愁绪很长时间里在我空虚惆怅的心里萦绕，萦绕。
我家兄妹五个，四个走完了上山下乡的路，我是最后一个。我
的回归，给家带来欢乐，同时也给父母带来了忧愁：儿媳、孙
子恐怕是归来无期。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父母和接受再教育十几
年的我都感到一种把握命运而无力后的迷茫。既已无缘以天下
为己任，就面对现实，思当今之幽情吧。我想。

七月、八月，我在家门口的庭院里垒起一间一面坡小屋，我和儿子有了栖息之地；九月，我以平均九十三分的成绩，加上邻人的举荐，上班了，我和儿子有了每月三十三元的生活费。接着，我朝朝暮暮地筹划她和儿子的问题。

人事处、劳动局、劳动部的门槛快让我踩平了，也不清楚说了多少稀松的话，也得到好几次申请调动的表格。然而填报的表格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每次询问都指指桌上日益增厚的表格给我看。和我同命运的知青太多了。他们早已懒得再听一遍理由，大同小异的述说再也打动不了他们，他们也无能为力。千种风情，万种思绪，原来是多余的，我多余再来。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她千里迢迢来探亲，没有一点儿好消息传给她，没有一句埋怨留给我。她整天默默地收拾着我的小屋，收拾着我和儿子。她更憔悴了，她挣扎在孤独中。十几天后，带着儿子走了，说是有个伴儿，只留下了柔情蜜意的遐想。

面会有的。一切会好的。我安慰她，也激励我。仗着十几年知青生活炼出的坚忍，我认定了“曲线救家”的路。给山东的河北的，我熟悉的、认识的、甚至听说的叔叔阿姨写信，一封又一封，不管能否得到回音，还是不厌其烦地倾泄苦衷，乞求帮助。不知是衷情感动了上帝，还是恒心触动了人情，两个月以后，我与河北的李叔叔建立了通讯交往。不久，在一封信里，李叔叔答应把她调到保定市。从此，北京到保定的火车成了我的通勤车，我也时常接到李叔叔打给我的长途电话。

她的简历、情况介绍、各种证明材料源源寄往保定，每星期六我都去保定，想方设法促进事态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我和她都盼望走好第一步。

在保定，我一无亲二无故，尽管我可以娓娓动听地描述她

的贤能，信口胡言我俩分居旷久，但是这些全不能作为硬邦邦的调动理由。我寻思：瞒天过海尚许有成功的可能，实事求是却可能头破血流。关键时刻，先把“人格”“尊严”放一放，为了她和儿子，睁眼儿说瞎话吧。我硬着头皮，吃力地在申请表的“调入理由”栏填上“两地分居”，我的工作单位也“迁”到了保定。

这份为解决两地分居而申请调入的表格经逐级劳动部门审批居然通过了，一个月以后，带着市劳动局的红色印章转到了省里。李叔叔告诉我，从外省调入的审批工作，每年只进行一次，都在上半年，现在已是十月份，恐怕有些麻烦。还说，他去想办法托人游说一下，让我耐心等他消息。我的心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上，我不敢把真情告诉她，怕她经受不住垮了。我整日坐卧不安，上班就神不守舍地守在电话边。同事们每天把午饭打到办公室，唯恐我失去什么，他们为我着急，也为我担心。

两个月了，一直没得到李叔叔的消息，希望越来越渺茫。我有点神经了，常常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愣神儿。

电话铃在响，我一动不动，反正不是我的。

“晓和！你的！”关君冲我喊，“不是北京人。”

我紧张得直颤，耳机贴紧耳朵。“李叔叔，你再说一遍。”

“尽快到保定办商调手续。邮寄怕你着急。”

1981年12月19日，是我命运转机的伟大的一天吗？我自问。

在同事的催促下，四个小时后，我撞开保定市劳动局的大门。午饭不吃了，揣着刚刚得到的表，迈开“11路”，在保定市里风风火火地转。城东的接收单位，城北的上级单位，城西的

再上级单位，一个个大印盖在“同意调入”上。路边，裹紧上衣，扎紧围巾、揣手缩脖的人群不时瞥过一眼，看着我冒着水气的头发和挎在臂弯里的上衣。冬季主旋律中一个不协调的音符，时慢时快，旁若无人，表情呆板地跳跃着，谁也理解不了我这个怪物。我顾不得周围人的议论，一门心思，早点换到那纸调令。

连夜回北京，连夜赶到火车票预售处。

售票处门口排队的竟然有很多是当年的知青。他们冒着寒风通宵站队，都是为了挤到一张元旦与亲人团聚的车票。他们饱含着对分居生活的忧郁和恐惧，大声咒骂着，互相寒暄着。一群经历了洗礼的知青，一见如故，挤在一起。

和他们相比，我毕竟多了一张调令。尽管它只能缩小我和她的空间距离，我还是成了知青的心目中的“英雄”。这一点点点优越感激起我对他们的同情，我一边嚼着不知那位知青递过来的烧饼，一边向他们介绍“经验”。自发的“经验发布会”吸引了众多的“活鳏夫”“活寡妇”，我把许许多多道听途说的经验仔细地揉进亲身经历，云山雾罩地侃了一通。天知道他们能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如此丰富的经验中，悟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

我又站在迎春车站的月台上。凌晨三点多钟正是北大荒最冷的时间，凛冽的西北风卷起漫天大雪无情地砸来，北国大地以它独有的方式款待着每一个冬季下车的旅客。我迎风站稳，霎间，冰雪砸醒我昏沉沉的头，我背过身去，任凭风鼓起衣裳，把我送进茫茫冬夜。

离开车站就是一片漆黑。沿着依稀可见的雪路，我庆幸今晚一路顺风，不然，这么大的“烟儿炮”，怕是神仙也辨不出方

向。宿舍区到了，相距很远的路灯在风雪中泛着瑟瑟的黄光，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房子被风卷得发出阵阵呻吟。好不容易找到她住的房子，仔细分辨一下院外的杂物，认定无误后，我艰难地翻过用树条子围扎起的院杖子，踩着满院的积雪走到门前。

没来得及脱去手套，里面灯亮了，“是晓和吧！”我赶忙应了一声。门开了，她一把把我拽进屋，扑了过来。

她在发烧，我给她裹上被子，只听她喃喃地说：“我觉得你在刚才那列车上。我觉得门口有人，我觉得你到家了。”我惊叹她对我的感知超过了所有人，甚至有特异功能的人。儿子醒了，一脸菜色，木讷地盯着我，害怕地钻进她的被窝。

“快，叫爸爸！”她说。说了好几遍，儿子才像想起了什么似地喊了声“爸爸”，扑簌簌淌下泪，我、她、儿子抱在一起，一直到天亮……

顾不上还在发烧，她拿着商调信，上上下下折腾了一天，总算办完了应备手续。第三天一大早儿，我就到了迎春镇派出所。

一位民警面对着火炉，背对着我，没等我說完，懒洋洋地甩出一句：“户口冻结，节后再来。”我断定他不是知青，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没有一个是知青。他对我的苦衷不屑一顾，他是孙子，他不属于我们这一代。

这一个元旦，我心情很不好。

元旦一过，又来到派出所，我站在门口，掸掉身上的霜，跺去脚上的雪，毕恭毕敬地走进热烘烘的办公室。“怎么又来了！节不是没过吗！”他妈的，这小子让我等到春节。我压住火，乞求，一切努力都改变不了现实，我的火压不住了，大喊大叫，那民警的火气比我还大，甚尔流出可憎可恶的嘲弄。权柄在人家手里，我还蹦达什么？我快快离去。

东方不亮西方亮，正门不通斜门畅。我托机械厂保卫科的老孙，不晓得是否有那个“冻结户口”的令儿，反正是人情通天，我拿到了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

接下来是走亲访友，拜别师傅，托运行李，打点行装，1982年元月6号，我、她和儿子一起坐在车厢里。无心流连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恨不得飞到保定。

中国的事罗罗嗦嗦、拖拖拉拉。拖来拖去，一直拖到1982年春节过后，才安置完她的工作。我在韩村为她租了一间农民房，糊好窗户纸，装上炉子，买来冬季用煤，搭个简易床铺。这房子到处漏风，只好先凑合了。她噙着泪，带着儿子留在这陌生的村庄。

没几天，鬼使神差，我在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张寻求对调的告示，我照葫芦画瓢，刻印了一大堆“对调告示”，隔三岔五，在清冷的月光下游荡，时不时在显眼的地方贴上一张。她在保定，哄睡孩子，也摸黑进城，壮着胆儿，干着和我同样的营生。初春的风吹裂了手和脸，身在异地的我和她，孜孜不倦地忙乎着我们自认为有希望的事儿。

一天晚上，冷风嗖嗖，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夜游北京城。猛然看见前边广告牌下，一个人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发现来人匆匆离去。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狠蹬了几步，骗腿儿下了自行车，凑到广告牌上搜索，几张浆糊还没冻上的“对调告示”七扭八歪地扒在那儿，其中一张盖在我昨天贴的那张上。一群曾经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知青，怎么都被挤到这么一小块天地里了。我掏出我的告示，在它边上又贴上一张。不久我的告示已经布满京城了。

还别说，反应真快。一连几天都接到和我谈对调的电话，一

打听，全是知青。那些纷至沓来的知青干嘛要离开北京，言谈中我才知道，他们打算用这个方法，换来全家团圆。有的希望我能把他留在知青点的妻调来，有的请求我能安置她那远在西北的丈夫，有的想解决妻子儿女的农业户口，有的只盼着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哪怕是郊区农村。我自知，和我对调的知青们所提出的每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我都没有能力满足。我们这一群知青的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不敢再和他们谈对调了，我不愿勾起知青们的思恋之情。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一转眼，天暖和了。做完手术没等拆线，我离开医院到保定看她，院落里阳光灿烂，土屋里却还阴冷。看着遍地鼠迹和补了又补的窗户纸，我怎么也找不出安慰她的话。伤口撕撕拉拉的痛。我抱着儿子，靠在被褥上，听她忧郁地诉说，如哭如泣。

“每天都有人来舔窗户纸，补也补不过来。找过队里，队里说这是听房，没事儿。还有，夜里老有人扒拉门闩，我害怕极了，搂着儿子不敢出气儿。亏了你把门闩搞成死的。房东家姑娘陪了我几天，说什么也不呆了。”

“那天，一只大耗从顶棚上过，‘哗啦’一下顶棚破了，耗子掉下来，一翻身爬起来，在床上还遛了一圈，才不慌不忙地跳下床，进洞去。我腿都吓软了。”

“一回，骑车带孩子回家，刚进村儿，路边吃草的驴突然冲着我俩大叫，驴脑袋快碰着我了。儿子吓哭了，我们连人带车摔到沟里。”

.....

我知道，这不是天方夜谭，可我能说什么？我狼狈透了。搜肠刮肚找出来的几句话，堵在嗓子眼儿，像哑巴一样，嘴一张